

目 录

上卷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1945年)	1
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 (1945年)	6
从“长安十载”到“夔府孤城” (1952年)	11
《杜甫诗选》前言 (1952年)	117
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 (1962年)	130
论杜诗和它的遭遇 (1962年)	145
日文版《诗人杜甫》序 (1985年)	165
谈《儒林外史》 (1954年)	170
评福兰阁教授的李贽研究 (1940年)	185
中国文学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1959年)	190
从《古文观止》谈中国散文的特点 (1981年)	201
论历史的教训 (1944年)	205
批评与论战 (1947年)	210
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 (1984年)	218
要慎重使用西方的文学学术语 (1983年)	223
纪念鲁迅要扩大鲁迅研究的领域 (1981年)	233
《花城袖珍诗丛》总序 (1984年)	237

欣慰与“困惑”(1986年)	239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1982年)	242
——《李广田文集》序	
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 (1947年)	261

下卷

读歌德诗的几点体会(1982年)	269
歌德的晚年(1941年)	282
——读《爱欲三部曲》后记	
《浮士德》里的魔(1943年)	292
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 (1944年)	314
《浮士德》海伦娜悲剧分析(1979年)	329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文译本序言 (1943年)	357
“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1985年)	375
——《论歌德》代序	
歌德与杜甫(1980年)	399
歌德学术讨论会开幕词(1983年)	415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本序(1984年)	420
《海涅诗选》译者前言(1956年)	428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译者前言 (1977年)	443
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1941年)	460
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1945年)	468

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点意见(1958年)	473
里尔克(1936年)	481
——为10周年祭日作	
工作而等待(1943年)	486
《当代北欧短篇小说集》序(1985年)	493
纪念《译文》创刊50周年笔谈(1985年)	501
 自传	 507
 主要著译目录	 511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杜甫的死年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1175年。在这长久的时间内，中国经过许多变化，我们眼前的世界自然不是杜甫所看过的世界了，但是杜甫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却一天比一天更为亲切起来。尤其是近几年，杂志上常常见到关于杜甫的文章，书局里有关于杜甫的书籍出版，学术界也常有关于杜甫的讲演，使人感到，拨开那些诗话与笔记之类在他周围散布的云雾，而露出他的本来面貌与真精神的时日好象快要到了。

一个过去的诗人在百年后，甚至千年后，又重新被人认识，又能发生作用，在文学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人们把这现象称作“某某的再生”。所谓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于“同”，有的由于“异”；前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在过去某某诗人的身上发现同点，起了共鸣，后者是一个时代正缺乏某某诗人的精神，需要他来补充。以近30年而论，在民国10年左右，青年人的情感经过五四运动得到解放，但是无论在政治上或社会上以及两性的关系上都不易寻得出路，于是陷入感伤的或彷徨的状态，所以后主词，《漱玉词》，甚至《饮水词》和《两当轩集》都成为

当时一般青年心爱的读物。这是由于“同”。至于同时兴起的对于屈原的不断的研究与推崇，可以说是由于“异”，因为《楚辞》里那样丰富的想象，强力的表现，浓挚的深情，正是当时所缺乏的。再以介绍西洋文学而论，在为自由而战斗的高潮中，谁不会神往于拜伦的英姿呢，等到情感泛滥得不可收拾时，歌德也有人感到需要了。——这“同”与“异”的两个因素，我们不愿意估计它们价值的高下，但如果我们给它们下一个比喻，那应由于“同”者，有若寻友，由于“异”者，有若求师。寻到了朋友，可以哀乐共享；可是得到了良师，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自己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获得。

现在我们虚心和杜甫接近，因为无论由于同，或是由于异，我们两方面都需要他。在“同”的方面，我们早已片断地认识杜甫了；当国内频年苦于军阀的内战，非战思想最普遍时，《兵车行》一类的诗成为学校中流行的读物；在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初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则一再被人引用，引用者甚至有的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可是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写赋敛之繁，《枯棕》《客从南溟来》诸诗最为沉痛；“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贫富过分的悬殊而产生的不平在“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亦足”这两句里写得多么有力；“丧乱死多门”，是一个缺乏组

织力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的命运。这还不够，命运还使杜甫有一次陷入贼中，因此而产生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诸诗，这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同时他又替我们想象出，一旦胜利了，那些被敌人摧残过的人民必定快乐得“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可惜我们现在很使那些只待献香醪的人们失望！）

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象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同时我们却也惊心地看着，中国的文化在这1 000多年内实在陷入一种停滯的状态，这中间尽管有过两宋的理学、清初的汉学、晚明（那个黑暗时代）的所谓性灵文学，而这些与一般的人民是不相干的，一遇变乱，人民所蒙受的痛苦与杜甫的时代并没有多少不同。由于这些“同”，我们需要杜甫，有如需要一个朋友替我们陈述痛苦一般。但是如果我们不止于此，再望下想一想，为什么与杜甫同时而又与杜甫同享盛名的李白与王维就不能这样替我们说话，他们不是同样经过天宝之乱吗？这样一问，杜甫就不只限于是我们的朋友了，他对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师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更需要他。

杜甫在秦州，囊空如洗，只“留得一钱看”时，写过这样两句：“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诚然，在当时，无知恶少都可以“谈笑觅封侯”，“乡里小儿狐白裘”更不是难事，杜甫舍此不求，而自趋于“艰难”，这是他认定的道路。另一方面，他“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他在他的诗里也屡屡提到“庞德公”，对于隐逸生活不但称赞，有时还羡慕，但是他不能这样生活。他44岁时“穷年忧黎

元，叹息肠内热”，到55岁经过10多年流离的痛苦，仍然是“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他之所以这样，正因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是他的性格。他坚持他的性格，坚持他的道路，在他深深地意识到“吾道竟何之”，“处处是穷途”时，则宁愿自甘贱役，宁愿把自己看成零，看成无，——但是从这个零、这个无里边在20年的时间内创造出惊人的伟大。这样的生活态度，在中国的诗人中是少有的，怕只有屈原能与之相比。这里边没有超然，没有洒脱，只有执著：执著于自然，执著于人生。中国的自然诗很多，但是有谁写过象杜甫从秦州经同谷到成都一路上那样的纪行诗，使人“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的呢？这是一段艰险的路程，这些诗不仅是用眼看出来的，也不是用心神会出来的，而是用他饥饿的身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在中国诗人中更有谁把一个时代整个的图像融汇在象杜甫在天宝之乱前后与夔州以后所写的那样的长篇巨制里的呢？只有作人执著，作诗也执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才会有如此惊人的成绩。

杜甫不但毫无躲避地承受这些“艰难”，他还专心一意地寻找“艰难”。“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掣鲸鱼于碧海，是艰难的工作，他却执著地要这样做。因此动物界里的马与鹰，自然界里的大江与落日，在他的诗里都得到适当的地位；人间的悲壮感与崇高感在他的诗里也得到充实的表现。另一方面，他并不缺乏翡翠兰苕的优美感，他写过“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他写过“鹅儿黄似酒，对酒爱鹅儿”，但这只是他暂时的休息，正如他走入某寺院，游某山庄，精神上感到一时的舒快一般，

走出来他面前仍然是艰难的现实。这类的诗，以他在长安任左拾遗与初至成都时写得最多，（这两个短期也诚然是他生命里两段暂时的休息）——就是这一部分诗也足足抵得住一个整个的王维！

杜甫由于这种执著的精神才能那样有力地写出他所经历过的山川，那样广泛地描绘出他时代的图像，使我们读了他的诗，觉得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都亲切。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

1945年

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

四五年来，因为爱读杜甫的诗，内心里常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想更进一步认识杜甫这个人。当然，从作品里认识作者，是最简捷的途径，用不着走什么迂途，并且除此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道路。但我们望深处一问：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些，往往藏匿在作品的后面，形成一个秘密，有时透露出一道微光，有时使人难于寻找线索。这秘密象是自然的秘密一样，自然科学者怎样努力阐明自然，文学研究者就应该怎样努力于揭开这个帷幕。

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这工作，在欧洲18世纪时业已开端，19世纪后半叶已经发展，如今，用分析方法的也有，用综合方法的也有，只着重诗人内心变化的也有，认为客观环境是作品先决条件的也有，材料不辨真伪不加剪裁堆积得象一部长

篇的也有，别具匠心写得象一部动人的文艺作品的也有，总之，这门工作的成绩已经蔚然可观，不只是第一流的诗人，就是第二流第三流的诗人也进入这些研究者的视野了。但是在中国，这部门的书架上几乎还是空空的。不知道中国人对于这类工作的需要是感到了而觉得无从着手呢，还是根本没有感到？中国人过去对于诗的研究，不外乎考据、注解、欣赏（这就是那一本又一本的诗话）三种。前二者，我们非常感谢，因为在考据与注解上边下功夫的人们都是辛苦的造桥者，尽量使读者和作品接近；至于那些一条一条的诗话，我就不敢恭维了，写诗话的人们对于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肯去了解他的全貌，只任意拿一首诗甚至一句诗来品评，来吟味，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诗人或不无阐发，但对于一个有首有尾、有始有终、象长江大河似的杜甫写的那些诗篇则往往不免于以管窥天了。

我的愿望尽管很迫切，可是直到现在并没有一部杜甫传或杜甫研究来满足这个愿望。向外求之不得，只好反过来求诸自己了。我于是，大约在一年前，有了一个大胆的企图，想写一部“杜甫传”。

在我起始预备这个工作时，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史料的缺乏。研究一个诗人的人格的培养与演变，在他的作品以外，如果能有些信札日记一类的东西与同时代人关于他的记载流传下来，自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但关于杜甫的，除却几个同时代的友人的赠答诗外，这类的材料就几乎等于零。杜甫死后三四十年，元稹、韩愈渐渐认识杜甫的价值，可是他们的言论则只限于推崇与赞美，我们并不能由此多知道一些杜甫这个人。新旧唐书里虽列有本传，却都

是粗枝大叶，处处显露出作史者的疏忽：旧唐书本传不及600字，新唐书不及800字，在这两篇短短的文字中，用杜诗可以证明是错误的地方，大小共有十几处之多，这使人觉得，作史者在写杜甫本传时，连可以得到的杜甫的诗都好像没有找来参考一下，这样的史家记载，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

我由于向外寻求的失败，最后只有对于这方面断念，完全回到杜诗本身，“以杜解杜”。但杜甫30岁以前的少作，大都湮没了，我们既不能读到他“自七岁所缀诗笔……约千有余篇”的一大部分，自然也难于较为具体地追寻他吴越齐赵的游踪。可是如果我们甘心于他30岁以前的生活是一块空白，我们又何必写他的传记呢？——一部传记最初要探讨的，不外乎我在上边所说的：这诗人承袭了什么？学习了什么？经验了什么？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作品的产生与作品中表现的一切。而这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几乎都要在他青少年时代里得到回答。我只有海里摸针似地尽量从他30岁以后的诗与散文里寻找有关于前两个问题的材料去解答：他是从怎样一个家庭里生长的？他在思想方面与文艺方面接受了什么传统？所谓“读书破万卷”到底都是哪些书？他青年时的漫游对他有什么影响？……这中间我深深意识到我在冒着一个大危险，因为材料的贫乏，有时不能不运用我的想象，可是想象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所以我骑在这匹想象的马上，又不能不随时都用“根据”的羁绊勒着它。

至于第三个问题，也可以说和第二个问题是分不开的，因为从书本上学习是间接的经验，从现实生活上经验是直

接的学习。杜甫所经验的，比唐代任何一个诗人都丰富，并且都在他的诗里留下痕迹。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关于杜甫30岁以后的，我们从他的诗里有取之不尽的丰富的材料。如果我们放开笔，可以以唐代的山川城市为背景，画出一幅广大而错综的社会图象，在这图画里杜甫是怎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他的命运。

我由于对史料缺乏信任，就是关于杜甫时的社会情形，也尽量从杜甫的作品中摄取。若是遇有与史书不合的地方，我宁愿相信杜甫所记的是真实的。这中间可能发生“诗与真”的问题，因为诗人总不免有些地方会利用想象使事实改变面目。但这问题我认为是不能在杜甫传里发生的，如果发生了，就无异于否定杜甫所表现的世界。所以我只处处以杜甫的作品为根据，一步步推求杜甫的生活与环境，随后再返过来用我所推求的结果去阐明他的作品。

最后，万一能够有一个杜甫的图像显露在我的面前，那么不管我怎样小心，我也不敢说，这是杜甫的本来面目，因为无论用什么方法，使过去的人与事再现一次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也要极力避免使杜甫现代化，因为用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去点染将及1200年前的一个古人，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原谅的罪行，纵使我们眼前的社会与杜甫诗里所表现的还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我只希望这幅图像使人一望便知道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这道理，在艺术界里很明白显然，我们只要看一看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便可以了解，但是在传记文学里似乎还有饶舌一次的必要。

这本书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我现在无从预测。但愿

它能够是一部朴素而有生命的叙述,不要成为干枯的考据,虽然我在这里尽量采用了许多前人的精细而值得钦佩的考据成果;同时我也不愿意使它象法国莫路瓦所写的传记那样,几乎成为自由的创作。总之,若是没有杜甫的诗,这本书根本就不必写;可是这本书如果一旦写成了,我希望,纵使离开杜甫的诗,它也可以独立。

1945年

从“长安十载”到“夔府孤城”

长安十载

唐代的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京城。东西18里115步，南北15里175步，全城除去城北的皇宫和东西两市，共有110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坊，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它自从582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建立后，随时都在发展着，到了天宝时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里边散布着统治者的宫殿府邸、各种宗教的庙宇、商店和旅舍，以及公开的和私人的园林。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少没有到过长安的，他们都爱用他们的诗句写出长安地势的雄浑、城坊的整饬、统治阶级豪华的生活和日日夜夜在那里演出的兴衰隆替的活剧。杜甫在他35岁时（746）也到了长安，但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耀人眼目的事物上；他一年年地住下去，在这些事物以外，还看到统治集团的腐化和人民的痛苦。他在一首赠给张垞的诗里说他多年漫游所得的结果是“适越空颠蹶，游梁竟惨凄”；他在洛阳经历了许多人间的机巧；如今他到了长安，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

官职。他和佛教的因缘不深，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无论是家庭的儒术传统或是个人的要求都促使他必须在政府里谋得一个工作的地位。他的父亲由兖州司马改任距长安不远的奉天（陕西乾县）县令，也许是使他西去关中的附带原因。不料在长安一住10年，他得到的并不是显要的官职，而是对于现实的认识，由此他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一片新的国土。

这时的政治正显露出日趋腐化的征象。李隆基作了30多年的皇帝，眼看着海内升平，社会富庶，觉得国内再也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太平思想麻痹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这个年过60的皇帝，十几年来迷信道教，不是亲自听见神仙在空中说话，就是有人报告他在紫云里看见玄元皇帝（即老君），或是某处有符瑞出现，使他相信他将要在一个永久升平的世界里永生不死。同时他又把自己关闭在宫禁中，寻求官感的享乐，终日沉溺声色，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把一切政权都交付给中书令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他谄媚玄宗左右，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他已经获得的宠信；他杜绝讽谏，掩蔽聪明，以完成他的奸诈；他忌妒贤才，压抑比他有能力的人，以保持他的地位；并且一再制造大狱，诬陷与他不合作的重要官员，以扩张他的势力。因此开元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比较正直的、耿介的、有才能的、或是放诞的、狷洁的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遭受他的暗算与陷害。杜甫所推崇的张九龄、严挺之都被他排挤，离开京师，不久便先后死去；惊赏李白的天才、相与金龟换酒的贺知章也上疏请度为道士，归还乡里；随后李邕在北海太守的

任上被李林甫的特务杀害，左丞相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不久也被迫自杀；与李适之友好、后来与杜甫关系非常密切的房琯也贬为宜春太守。这时的长安被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几年前饮中八仙的那种浪漫的气氛几乎扫荡无余了。李林甫以外，政府里的人物不是象王铁、杨国忠那样的贪污，就是象陈希烈那样的庸懦。——杜甫初到长安，漫游时代的豪放情绪还没有消逝，他在咸阳的旅舍里度天宝五载的除夕时，还能和旅舍里的客人们在明亮的烛光下高呼赌博。但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渐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依恋。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对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帝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尤其是从外面回到寂寞的书斋，无论在风霜逼人的冬日，或是望着渭北的春天，他终日只思念着李白；孔巢父从长安回江东时，别筵上他也一再托付他，向李白问讯。他这样怀念李白，就是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

唐玄宗终日在深宫里纵情声色，对于外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模糊，从一个精明有为的帝王变成一个糊涂天子。他有时偶然想到人民，豁免百姓的租税，但那些贪污的权臣的横征暴敛比他所豁免的要超过许多倍。747年，他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李林甫最疾恨文人和艺术家，因为这些人来自民间，不识“礼度”，他恐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他不利，于是摆布阴谋，让这次

应征的举人在考试时没有一人及第。揭晓后，他反而上表祝贺，说这足以证明如今的民间没有剩余的贤能。玄宗也只好这样受他蒙混。杜甫和诗人元结（723～772）都曾经参加过这个欺骗的考试。杜甫本来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并且以为一定能够成功，不料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诗里一再提到这件伤心事，等到752年李林甫死后，他更放胆说出他几年来胸中的悲愤：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指李林甫专权）；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这是杜甫在李林甫的阴谋政治里遇到的打击，同时他私人的经济情形也起了大变化。他父亲可能在奉天县令的任上不久便死去了；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不能不低声下气，充作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当时有一小部分贵族承袭着前代的遗风，除去在他们的府邸园林中享受闲散的生活外，还延揽几个文人、乐工、书家、画师作为生活的点缀。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起什么作用，可是据有充足的财富，随时给宾客们一些小恩小惠。宾客追随着他们，陪他们诗酒宴游，维持自己可怜的生计；有时酒酣耳热，主客间也仿佛暂时泯除了等级的界限，彼此成为“朋友”。杜甫就作过这样的宾客。他除此以外，还找到一个副业，他在山野里采撷或在阶前种植一些药物，随时呈献给他们，换取一些“药价”，表示从他们手里领到的钱财不是白白得来的。这就是他后来